

菩提本无树

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

张五常是怎样一个人，相熟的与不相熟的都有些话可说。这个怪现象我难以解释。虽然我很少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，但从朋友口中还是时有所闻。这些评价当然有好有坏。我没有作过统计，但下意识地对不好的评价我忘记得很快。于是，我很容易地觉得比毛泽东的功、过七三开高一点。对胡耀邦所主张的八二开——八褒二贬——也就接受了。关心我的朋友似乎也有类似的估计。

本来，八二开是很好的成绩了。没有谁考试获得八十分会大叹倒霉的。问题是，他人对我的评价。无论是八之褒或二之贬，都言过其

实。我既非超人，也非败类，但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“中庸”的评价？得不到的永远都觉得特别珍贵。中庸的朋友羡慕我，而我却衷心羡慕他们我又想，“中庸”是美德，但却非新闻，是不容易招惹评论的。既然人们看我都从两端看，言过其实是免不了的吧。

说起来，他人喜欢把我作为话题，已不是今天或二、三十年来的事了。从我两岁多稍懂事的那天起，我就有这个感受，而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引人注意的。一些童年时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一九三八年初，母亲在西湾河的奥背龙村建石屋。她要“监工”，希望屋子建得如她所愿，就把我带到地盘上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看工人搓水泥，好奇地点数英泥、水与沙的分量，有规律地二三二三地数起来。突然间见工人少用了一铲沙（不照规律），就急不及待地指着工人大哭起来了。母亲说：“阿常又搞什么鬼呀？”姐姐们应声附和：“又是阿常！”自此以后，无论家中发生什么事，“阿常，阿常”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三岁到邻家读幼稚园，教师是一位吴姑娘，人长得美，脾气好得出奇。学生只有三

个。我年纪最小，每次背诵课文时都是由其他两个同学先背，轮到我，即使背不出，吴姑娘也总是一笑置之。有一次背书时间到了，同学又照例地先背，我提出反对，坚持非先背不可。吴姑娘当然顺我意，让我先背。但我根本不知道背什么，一句也背不出来。吴姑娘于是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争着先背呀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说要先背，可没有说我背得出来的。”数十年后，吴姑娘老了，还提及这件事。

诸如此类的例子，每隔几天都会发生。家人见惯了，不觉得什么，但见不惯的外人就不免要多说几句。抗战期间在广西，战后在佛山，解放后在香港的湾仔书院与皇仁中学，五七年到多伦多，五九年到洛杉矶，六七年到芝加哥，六九年到西雅图，八二年回港，其经历也大约如是。年纪大了，经验不同，感受不同，观点不同，但童心未泯，好奇心从来未离开过我，它往往驱使我做自感兴趣的一切。好奇是人之常情，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但好奇又怎会那样容易地引起人们的议论呢？这问题我不明白，久而久之，习惯了，也就懒得找寻答案。

我是热爱生命的。我认为生命既然只有一次，我就要尽可能“丰满”自己的生命。在大学念书时，修人类学，得到一位老师的启发，知道生命的存在是宇宙数百万亿无一的机缘巧合所成，是一个可一而不可再的“意外”，于是就变得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而且也珍惜他人的生命了。我决定从事教育工作，对中国的思想教育深感痛心，也是由此而起。我并非因为自以为是君子而不损害他人，而是自己对生命的观点不容许我那样做。

但在广阔无际的宇宙间，个人的生命远不及沧海一粟。我的存在与毁灭，无足轻重。说自己有“泥上偶然留指爪”的本领，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。但生命既然存在而又是那么真实，我倒要过一下生命的瘾。这不是有意无中生有，然而，自内而观之，可以因为觉得丰满而把自己看“大”了一点。至于他人从外观我呢，应该觉得是微不足道的，因为个人生命的存在，只可以珍惜，而不能把生命本身扩大的。想不到，他人自外而观我似乎比我自己的内观还要夸张了。

我于是想起六祖的诗，忍不住把它改两个

字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还要惹尘埃。”是的，我没有六祖的胸怀，但比起神秀和尚，却要高明一点。我对惹来的尘埃毫不介意，所以老是提不起劲去“时时勤拂拭”了。劝我久不久要“拂拭”一下的朋友，应该明白在这问题上，我心领而不苟同，是因为个人的生命观是不容易改变的。

曾因酒醉鞭名马

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

我是个失败过很多次的人。失败本来是一件痛苦的事，然而，这痛苦很短暂，过不了多久又再次尝试。对我来说，胜利的欢欣比失败的痛苦远为持久，所以虽然败多胜少，但在心底里老是觉得自己是个优胜者。

这可能是天生的品性吧。我的儿子跟我一样，对失败处之泰然，不断尝试。记得八二年回港后，我建议儿子以考试的办法进入本地的中学。我到一间颇有名望的学校去查询有关入学的资格，校长很客气，说我的儿子在美国长大，英语不用考了，但数学要考。然后他拿一份数学试题的实例给我看，我一看就知道儿子

不可能及格。美国小学所教的数学是理论，不是数学问题的解答，所以香港初中的数学比美国的深得多，而我见到的试题大都是儿子从未学过的。

回到家里，对儿子说：“明天你要考数学——但不用准备了，你是不可能及格的。”他没有回应。到了凌晨四时，我见到他的房间有灯光，跑进去看看。原来他正拿着一本美国小学的数学课本在温习。我百感交集，怜惜地说：“我不是说过准备也没用吗？那些数学你根本没有学过，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修补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也知道没有用，但不想使你失望。”后来十题中他只懂三题，一败涂地。晚饭后，儿子跑进我的书房里，坐在旁边，问：“爸，你对我很失望吧。”我庄重地回答：“怎可以这样说？你多长大一天，我对你的期望就多一点，怎会因为你考试考得不好就改变了主意？”

是的，克服困难的胜利使我有满足感。但每逢比赛、考试、研究——这些都是竞争——我要胜的是事物的本身而不是对手。例如下棋吧，我要争取的是一局好棋，走几步神来之着，对手是谁，名气大小，都不重要。搞摄

影，我希望获得的是一些隽永之作，至于我是否比其他摄影者高明，倒无关重要。他人下了一局好棋，或拍得一帧佳作，我爱之如己出也。读大学时考试，我追求完美而有新意的答案，积分如何不介于怀。在课堂上发问，我寻求的是一些新的角度，不管同学们怎样想。作研究，所得的结论要使自己有满足感。前辈或同行中的竞争者的结论如何，对我是很少影响的。

这种对事而不对人的竞争，胜与败的最后评判者还是我自己。例如，作学生时一篇文章获头奖，但我认为是二流货色，很失败，就不能不尴尬地写信去取消奖状。另一方面，这样为胜“事”而竞争，会使人觉得我喜欢独断独行“一土谔谔”，有时甚至如醉酒步行，难以捉摸。这不是因为我故作神秘，而是因为对事不对人，使误会者觉得我是把他们轻视了。有某些自以为在跟我竞争的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

对事的竞争，取胜绝不会比对人的容易，而二者的胜负分布也有不同。譬如下棋吧。我与棋王或普通棋手下棋，胜负的机会相差不很

远。不管对手是谁，但求棋走得潇洒，妙着迷人而过瘾，往往给低手难倒了。但假若胜了棋王，而自觉下得平平无奇，我是会感到失败的。

这样的对事竞争，会使一些胜了我的人奔走相告，但名家却往往招架不住。在学术上，不少大师级的人物给我无意识地、不经意地“杀”下马来。本来是令人尴尬的行为，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，竟然得到不少大师的鼓励，花更多时间来教我。上赫舒拉发的课，我脑子集中在分析上，往往在无意间“逼”他将分析修改。被传统接受了近二百年的佃农理论，因为我要解释一些中国农业的现象，就把这理论全盘推翻了。科斯为了盛极一时的“界外效益”理论不明所指，而说出他的迷惑，这一提点，使我有领悟而证明根本没有“界外效益”这一回事。某些大师以为我有意针对他们，其实我对他们很敬佩，但老是提不起劲去细读他们所写的关于“界外效益”的文章。

我的兴趣很广泛。因为要胜事而无意识地把名家“杀”下马来的例子，在经济学之外还有五六样玩意。

郁达夫的诗潇洒绝伦，记得其中某首有一联如下：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”名马我是鞭过的。虽然在鞭时没有喝酒，但也像醉酒那样，不知马是谁的，无意识地鞭下去。至于美人呢？她们毕竟是人而非事物，可不是我竞争的对象了。

后 记

写好了以上的文章，我好奇地重读郁达夫那首诗，发觉竟然适用于今日的中国，不胜感慨！但那差不多是六十年前所写的了。在这漫长的风风雨雨的日子里，炎黄子孙没有一天不遭受折磨，以致昔日的豪情烟消云散。我认为郁前辈所发的潇洒牢骚，在今天中国没有谁再可以发出来。兹录全诗如下：

不是尊前爱惜身，佯狂难免假成真。
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
劫数东南天作孽，鸡鸣风雨海扬尘。
悲歌痛哭终何补，义士纷纷说帝秦！

艾 智 仁

一九九〇年四月六日 ~ 五月十一日

(一)

艾智仁 (Armen A. Alchian) 是我的老师。这个师生关系，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。较少人知道的是，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。我是他的旁听生，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。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，我试把它写出来，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。

六〇年代初期，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，但于今回顾，那时其实是

如日中天。赫舒拉发（J. Hirshleifer）、普纳（K. Brunner）、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，是他们的全盛时期，锋芒毕露，不过，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。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。当时我不知道，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“明星”学生，相比之下，就知道了。如今，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。

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，起先打算读商科，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。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，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。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，说他如何高深莫测。艾氏当时不教低班，也少在校园走动，我没有机会见到他。然而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，我时有所闻。有一次跟有名的 Scoville 教授闲谈，说到艾智仁时，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，他笑笑说：“没有如此厉害吧，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。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。”我从小没有偶像，对任何人都不崇拜，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，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，心焉向往，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。

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；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。于是，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（R. E. Baldwin）选修。有一次，另一教授（C. Miller）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，提起艾智仁，他肯定地说：“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，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。”言犹在耳，大名鼎鼎的森穆逊（P. A. Samuelson）到加大演说，听众济济一堂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，森氏回答说：“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……”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，改口说：“啊，我说错了，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？”全室大笑！大家东张西望，要找一个人。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，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。

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。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，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，旁听就成了习惯。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，我当然特别关心。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，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。后者毕业于哈佛，曾在芝加哥任教，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，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“财务学”，

赫氏是开山鼻祖。（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，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，这是题外话。）

有一次，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，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：“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！”赫氏停下来，把讲义推开，神秘地微笑道：“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。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。很多年前，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，我遇到艾智仁。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。在研讨中，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，愚蠢得难以置信，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。很多人向他解释，但他老是不明白，坚持己见。我想，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。过了好一会，我见他耽搁时间，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。殊不知说到一半，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，只有他才是对的。”

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，我好奇地问：“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？”他坦率地回答：“我所知的广博，他的范围比较狭窄，但如无底深潭。”于今想来，这是识英雄、重英雄的衷心话。

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，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。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，但我知道，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。我硕士的成绩好，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，拜师于弗里德曼门下，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，就打消去意。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，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，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，就改迟了一年。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，但几位却像我一样，明知困难而为之。可以说，在听艾氏的课之前，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。

（二）

一九六三年初，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。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：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，也不准答话。在大学上课，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，但总带着张纸，装模作样地划点什么。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，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，专心聆听，一早就走进课堂，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，静静地坐着，如临大敌。

第一课，课室坐满了人——大概有五十多人吧——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，大部分是旁听生。铃声一响，艾智仁进入课室，鸦雀无声。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，见他长得高瘦，头发有点斑白，领带打得走了样，西服陈旧，但还算清洁。他向窗外望，笑了几下。“哈，这么多人！我敢打赌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。”我想，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。没有学生回应。他好像有点尴尬，继续说：“我从来不备课，没有讲义。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，天天想，想了那么多年，是不用准备的吧。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；今天写下来的，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。”

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，解释说：“我知道，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，你们就会麻烦我。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。只有这一份，你们影印后要还我。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，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，你们可以不读。”这样，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，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，跟着大家君子协定，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。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

读物看不上眼，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。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，秘笈无疑也。

就这样，他开始讲课了。他说：“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，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，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，怎么办？”问题提出来后，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，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。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伏地提出各个办法，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。下课的铃声响了，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，艾氏已匆匆离去。这是第一课。

每星期是三课，每课五十分钟，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，都找不到办法。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。显然，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，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。过了不久，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的话，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，和有什么含义。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（后来维持了两年），在不知不觉间，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、运用，大有所获。

一位老前辈的，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，见我们在“石头”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，便安慰我们，说艾氏教